

木府空间营造中的汉化传承研究

廖子欣 杨妍秋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, 云南省丽江市, 674100;

摘要: 丽江木府作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土司衙署建筑群, 是纳西族木氏土司权力与历史的物质见证。其宏大的建筑群在空间营造上, 深刻体现了木府在布局、形制及装饰上的汉、纳西文化融合策略。在其空间营造过程中, 在保留纳西族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融合了汉文化的特质, 形成了“纳西为体, 汉式为用”的独特营造体系。推动了地域文化的调适与升华, 为多民族地区文化融合提供了历史范例。

关键词: 丽江木府; 空间营造; 汉化传承; 文化融合

DOI: 10. 64216/3080-1516. 25. 05. 067

1 引言

1.1 研究背景

丽江木府建筑群作为纳西族木氏土司的权力中枢与行政驻地, 其历史定位呈现出双重维度: 既是体现中央王朝边疆治理智慧的空间实践, 又是展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建筑结晶。在中央王朝推行文化整合与地方民族文化互动的背景下, 这一建筑群落不仅延续了纳西族本土统治的制度特征, 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, 将汉族建筑礼制、藏族宗教符号与白族营造技艺等多元文化要素有机融入其空间肌理。

从文化遗产研究的视角来看, 木府的空间营造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形态建构。其建筑形态既体现了中原建筑文化的深刻影响, 又保留了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; 其院落布局与空间序列则构成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表达系统。这一系统不仅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适应过程, 还呈现了权力结构的空間化表征, 承载着多民族地区文化认同的建构历程。

作为汉文化传播与地方性知识互动的物质见证, 木府建筑群以其独特的空间语言, 为解读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格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样本。

1.2 研究目的与意义

本研究旨在解析木府空间营造中汉化传承的具体路径, 通过对其轴线格局、建筑形制与装饰符号的系统分析, 揭示汉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在地化转译机制。研究不仅可深化对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建筑文化的认知, 也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地域建筑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照。

2 木府建筑群空间营造的汉化特征解析

2.1 礼序与自然的融合: 宏观布局的汉化基调与在

地调适

在宏观布局上, 木府最为显著地采纳了中原建筑的核心礼制原则——中轴线对称, 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空间组织逻辑。自大门起始, 一条明确的中轴线以此串联仪门、议事厅、万卷楼、护法殿、玉音楼等核心建筑, 构建出层层递进、秩序井然的空间序列。这一布局深刻反映了木氏土司对中原王朝权力结构、儒家伦理秩序的深刻认同与效仿, 通过建筑语言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, 展现出“仿紫禁城”的政治诉求。

然而, 木府的轴线布局绝非对中原形制的机械复制, 而是展现出因地制宜的创造性转化。与北京紫禁城在平原地带追求的绝对对称与庄严肃穆不同, 木府的轴线巧妙地顺应了丽江坝子的天然地形与狮子山的蜿蜒走势。建筑群依循山势层层抬升, 既保持了中轴序列的礼制庄严, 又通过富有韵律的空间起伏, 营造出动静相济的独特节奏。

这一空间处理手法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: 一方面, 它植根于纳西族“崇自然、敬山水”的生态哲学, 将建筑视为自然环境的有机延伸; 另一方面, 它体现了木氏匠人在山地营造方面积累的卓越智慧, 通过精妙的台地处理、错层布局等手法, 实现了人工构筑与自然地貌的完美融合。

这种创造性的空间实践, 成功消解了中原礼制的严格规范与丽江特殊地形之间的张力, 使象征王朝秩序的“礼序”与体现地方智慧的“自然”达成了辩证统一。最终形成的“礼序为骨, 自然为魂”的格局, 既保持了中原建筑的文化象征意义, 又赋予了空间以鲜明的地域特征, 成为汉纳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。

2.2 形制与功能的借鉴: 建筑单体的符号化转译

在建筑单体的营造中, 木府展现出对汉代官式建筑

形制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。以议事厅为例,其严格按照《明会典》规制,采用歇山屋顶与斗拱体系,明间阔达五间,这些形制特征直接对应着中原衙署建筑的权力象征系统。这种形制转译不仅体现了木氏土司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,更通过建筑语言构建起符合儒家礼制的权力空间。

万卷楼的形制处理则展现出另一种转译路径。作为文化教化空间,其三重檐楼阁式造型源自汉族建筑中的“文运”意象,但在具体营造中进行了在地化调整。二层设置的“坐栏”式回廊,既保留了江南楼阁的优雅形态,又融入了纳西族“走马转角楼”的实用功能,形成独特的文化复合表达。这种形制上的创造性转化,体现了木氏土司在文化借鉴过程中的主体意识。

护法殿的建筑表达更为复杂多元。主体结构延续汉式梁架体系,但在关键部位融入藏族建筑语汇:檐下雀替雕刻莲瓣纹样,门楣装饰八吉祥图案,这些细部处理使建筑成为多元信仰的物质载体。这一建筑形制的多元并存格局,深刻体现了纳西族文化认同的复合结构:在政治层面以中原王朝为依归,在文化层面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,在信仰层面则延续着多元共生的传统特质。

居住建筑玉音楼的形制处理,则体现了对生活功能的优先考量。虽然采用汉式四合院的基本格局,但在空间尺度上适当缩小,选用本土云杉作为主要建材,室内空间划分延续了纳西族“三坊一照壁”的传统模式。这种形制转译既保持了官式建筑的仪轨,又延续了地方民居的宜居特性,实现了文化象征与实际功能的完美统一。

木府建筑单体的形制转译,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符号系统:在政治空间强调规制象征,在文化空间注重融合创新,在信仰空间保持多元共生,在生活空间侧重功能适应。这种基于功能需求的形制转译策略,不仅体现了纳西族在文化借鉴过程中的智慧选择,也为研究多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珍贵的建筑范本。

2.3 装饰与意象的共生:细部装饰的文化融合叙事

在建筑细部与景观营造中,木府展现出汉纳文化从形式借鉴到意境融合的升华。其装饰体系大量运用蝙蝠(福)、鹿(禄)、仙鹤(寿)等汉族吉祥符号,通过门窗棂格、梁枋彩画的精雕细琢,构建出完整的汉文化吉祥寓意系统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种装饰借鉴呈现出鲜明的在地化特征——工匠们巧妙地将汉族传统纹样与纳西族东巴文字、民族图腾等元素相融合,使中原文化的符号系统在丽江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,最终实现了从形式移植到意境再造的创造性转化。

这种文化融合在理水艺术中尤为深刻。木府引玉河

水构建的园林体系,既取法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、亭台掩映,又在关键节点延续纳西族“三眼井”的水源分级使用传统。这种处理不仅体现生态智慧,更将汉式园林的审美意境与纳西族水神崇拜的精神内涵相融合,形成“形神兼备”的独特景观。正如护法殿前的水池设计,既符合汉族风水“聚气”之理,又通过出水口的朝向与造型,暗合东巴文化中对水灵方位的崇拜传统。

这种装饰与意象的共生关系,使木府超越了单纯的建筑模仿,创造出既符合汉文化审美标准,又延续纳西精神内核的独特空间语言,成为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典范。

3 汉化传承的动因与机制探析

3.1 政治归附与文化认同的双重驱动

木氏土司自元明以来,采取了“诚心报国”的政治策略,积极向中央王朝靠拢,接受册封,并多次助朝廷平定周边叛乱。这种紧密的政治依附关系,是推动其建筑空间汉化的最直接动力。营造一座在规制和气度上可比拟中原衙署的府邸,是其向中央王朝展示忠诚、证明自身统治能力与管理水平的有力方式。因此,中轴线、威严的议事厅等元素,首先是政治姿态的空间表达。

与此同时,历经数代土司,尤其是木增时期的大力倡导,木氏家族内部形成了主动学习、吸收汉文化的风尚。汉族的儒家经典、诗词书画成为土司家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文化上的倾慕与认同,使得汉化从被动的政治要求,转变为主动的文化追求。建造万卷楼以藏书,在园林中题写匾额楹联,已不仅是附庸风雅,而是内在文化修养的外在投射。政治驱动与文化认同相辅相成,共同构成了汉化传承的内在逻辑。

3.2 多元文化交流中的选择与整合机制

丽江地处滇、藏、川交界,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,自古以来便是汉、藏、白、纳西等多民族文化的交汇点。木府身处这一“文化十字路口”,其汉化进程并非被动接受或单向复制,而是始终在多元文化的对比中主动选择、在差异中有机整合,成为多元文化共生的典型载体。

木氏土司凭借精准的文化判断与卓越的整合能力,以“实用主义适配需求、象征主义凝聚认同”为核心原则,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进行针对性取舍,形成了层次清晰的整合逻辑。

政治与礼制层面:为稳固政权、获取认同,木氏土司取法中原体系。木府复刻中原王府“中轴线对称、前朝后寝”布局,仿明朝官制设内部机构,还主动向中央进贡、受册封;门前“忠义”石牌坊依明皇家形制建造,

御笔题字既显对中央臣服，也巩固了自身统治合法性。

宗教信仰层面：为兼顾各族需求、凝聚民心，土司采取“多教并存”策略。木府内护法殿供奉佛教神祇、三清殿祭道教尊神，同时保留纳西东巴教祭祀，“一府多教”格局规避了信仰冲突，让各族民众获精神共鸣。

建筑技艺层面：立足实用与美学，木府融汇多族技艺。借鉴汉族“抬梁式”木构（适配抗震需求），吸纳白族“三坊一照壁”纹样等雕刻工艺，又保留纳西“依山傍水”理念，形成“汉构为骨、白雕为饰、纳西融境”风格。

4 木府空间营造的当代启示与价值重估

4.1 对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格局的空间印证

木府建筑群是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格局的空间典范，其建筑形制既遵循中原礼制秩序，又融合纳西、藏、白等多民族文化元素，生动诠释了“和而不同”的中华智慧。

这一建筑杰作超越了简单的文化拼贴，实现了“一体”与“多元”的有机统一，成为多民族文化创造性融合的杰出代表。木府的存在不仅见证了历史上边疆与中原的良性互动，更彰显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独特价值。

4.2 为文化遗产的“活态”保护与传承提供范式

木府建筑群的保护与利用实践，为多民族地区大型文化遗产的“活态传承”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方案。它成功跳脱了将历史建筑作为“静态标本”进行封闭式保护的窠臼，转而探索出一条“以活态传承延续文化生命”的可持续路径。它是一个“活的生命体”，其保护不仅是修复物质实体，更是要维系其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。今天的木府，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：它不仅是展示历史的博物馆，更是持续运作的“文化场域”——纳西古乐在此奏响，东巴仪式在此举行，民族节庆在此开展，历史空间由此被注入当代生活的温度，实现了文化功能的延续与重生。

这一模式的核心，在于对文化遗产“物质性”与“非物质性”双重属性的整合性保护。在精心维护其建筑本体的同时，更着力传承其承载的开放、包容与创新的文化精神。保护“物”的载体，是为了更好地存续“魂”的内核；而“魂”的活化，又反过来赋予“物”以新的生命力。

4.3 对当代地域性建筑创新的历史参照

在全球化浪潮下，如何避免“千城一面”，创造具

有地域特色和文化识别性的当代建筑，是摆在所有建筑师面前的课题。木府的营造智慧为此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参照。它告诉我们，地域性建筑的创新，根本在于文化上的自信与自觉。

木氏土司没有固步自封，也没有全盘汉化，而是基于自身的地理环境、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，对外来文化进行大胆地吸收、转化与再创造。这一历史经验对当代的启示清晰而深刻：我们无需拒绝现代技术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，但必须建立起如木府那般的主体性意识，去判断、选择、消化，最终将外来精华与本土基因相结合，创造出既是现代的、又是民族的新建筑。木府的“纳西为体，汉式为用”，在当代可以解读为“本土为体，全球为用”，这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文化创新方法论。

5 总结

丽江木府建筑群的空间营造，是一场深刻而复杂的汉化传承实践。它从宏观布局、建筑形制到细部装饰，系统性地展现了汉文化与纳西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融合。这一过程由政治归附与文化认同双重驱动，并通过一套卓越的文化选择与整合机制得以实现。

木府不仅是一座历史的丰碑，更是一座智慧的宝库。其中所体现的“和而不同”的融合智慧、“师法自然”的生态观念，以及最为核心的“文化自觉”意识，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的“多元一体”格局、探索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路径、以及构想植根本土又面向世界的建筑创新，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思想资源。深入解读木府，正是为了从其跨越时空的营造智慧中，汲取构建文化自信、开创未来的灵感与力量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杨伟兵. 中国土司历史地理与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[J]. 思想战线, 2022, 48(5): 110-117.
- [2] 陈歌, 毛志睿. 探究丽江木府的建造艺术[J]. 城市建设, 2020, 17(25): 4.
- [3] 朱丽雅. 明代丽江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[D]. 烟台大学, 2025.
- [4] 安琪. 汉藏间的抉择: 明代丽江木氏土官的文化认同研究[J].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, 2020, 12(6): 8.
- [5] 杨玉苹. 作为媒介的丽江木府: 空间媒介与族群文化身份的建构[J]. 新闻知识, 2025(2).

校级科研项目: 《中国传统礼制传承视角下——丽江合院系民居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》